

生态翻译视域下《长恨歌》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

李瑞雪¹, 刘佳²

(1.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2. 河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 带有地域和时代印记的文化负载词, 体现并传承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地域特征和风情民俗。生态翻译学为译者在翻译操作层面提供了适应与选择过程的环境, 有助于其得出文化负载词的最优译法。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角切入, 以许渊冲先生的《长恨歌》英译本为研究对象, 从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分析了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研究发现, 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适应了原文的生态环境, 翻译策略的取舍体现了译者在多维度上的适应与选择, 也使得原语生命成功得以在译语生态环境中长存和再生, 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的典型译例。

关键词: 生态翻译学; 文化负载词英译; 《长恨歌》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1-0015-06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31208584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he Everlasting Regre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LI Ruixue¹, LIU Jia²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yang 471000, China)

Abstract: With imprints of local identity in various times, culture-loaded words represent the national history, cultur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lk customs. And eco-translatology provides guidance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for translators at the operational level which can help them wit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Everlasting Regret* by Xu Yuanchong, the paper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loaded words in terms of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nslator adapted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original text in his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and h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reflect his selection and adaptation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s a result, the Chinese source language survives and regenerates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English target language, introducing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orld.

Keywords: Eco-translatolo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loaded words; *The Everlasting Regret*

收稿日期: 2023-12-08

基金项目: 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 2024 年度重点课题 (2024JKZD36)

第一作者: 李瑞雪, 女,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区域与国别研究。E-mail: lrxhh2023@163.com

通信作者: 刘佳, 女, 教授。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E-mail: liujia19751218@163.com

生态翻译学是以生态学原理作为指导原则系统地探讨翻译问题的理论^[1]。作为一种具有哲学和方法论意义上自成体系的普适性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既有坚固的哲学基础,又符合逻辑准绳和自然原理,对“何为译”“谁在译”和“为何译”提供了详细的理论阐释和方法论指导,为译介的探索提供了全新的视野。

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著的《长恨歌》是一部冠绝古今的长篇叙事诗,向世人生动地再现了杨玉环与李隆基缠绵悱恻的爱情传奇^[2],经由众多译者译为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长恨歌》体现了译境、译本和译者之间关联互动、互相依存和动态平衡的关系,也展现了许渊冲先生对这部作品的原文、原语和译语之间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适应和对译本最终行文选择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外译的背景下,以文化负载词作为切入点探讨许渊冲先生的英译策略,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借鉴与可行之法。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在古代典籍英译方面表现出了强大的应用力和解释力。例如:张晶等借用生态学理论探讨苏曼殊译诗的文学价值^[3];汪莹等以生态翻译学作为研究视角剖析黄克孙和黄杲忻两位译者在译诗过程中的主导作用^[4];龙翔等通过分析《饮酒》的译文效果为诗歌英译提供借鉴^[5]。国内众多学者都对古典诗歌英译做出过不同角度的研究,但较少学者研究诗歌典籍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与效果。鉴于此,本文拟将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长恨歌》置入生态翻译视域下,探究译者如何实现对古代诗歌典籍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保持译本、译境和译者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负载词的英译策略,以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新路径。

一、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孕育于21世纪初叶。胡庚申教授于2006年8月在国际会议上郑重宣读“生态翻译学诠释”一文,正式提及和系统化阐述“生态翻译学”理论。该理论的研究范式是将生态主义的整体观作为基本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作为支点,以“适应与选择”理论作为基构,以译境、译本

和译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为研究对象,从生态角度对翻译生态整体与理论本体进行总体概述^[6]。该理论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着力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相似性,从综衡化的角度去研究翻译之所惑,又是对翻译适应选择理论本质更深层次的挖掘与拓展。

生态翻译学以“生”作为发展之基石,讲求翻译生态、译本生命和译者生存,其中生态、生命和生存即为生态翻译学的“三生相”,通过研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三即”理念:“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和“翻译即适应选择”^[7]。“翻译即生态平衡”指的是以“尚中尚和”的思想分析翻译行为,强调翻译的整体与和谐,这是对传统范式单一性的创新;“翻译即文本移植”指的是从“生命形态”的角度去剖析翻译文本,不仅聚焦于传统范式的“对等性”特质,更侧重于“可移植性”的实质;“翻译即适应选择”指的是以“适应选择”为本源审察翻译的过程,趋向于“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的多维转换模式^[8]。

生态翻译学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贯穿了翻译体系、翻译理论与行为“三位一体”的研究^[9]。由此可得,生态翻译学以“三生”为主题,聚焦“三者”之间的关系,技术路线为“宏观、中观、微观”三层次的研究,昭示了“三即”理念。这些是生态翻译学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关联互动和互为因果,构成了以译境、文本和译者相互关联与作用的翻译共同体。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理论本体进行总体概述,系统性地回答了“何为译”“为何译”以及“怎样译”等有关翻译学的一系列问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与方法论指导。

二、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长恨歌》英译本

文学作品通常以语言作为媒介展现人类的生活、思想和情感体验等,蕴含和传达某种特定的文化信息,给予读者以心灵上的触动、艺术上的美感以及思想上的启迪。译作的表达、认知、交际和文化等功能的实现,并非直接通过目标语阐

述作品的语言和内容本身,而是需要深入挖掘译者、文本以及译境三者之间联动和平衡的关系,在重塑原作文化预设的前提下能动地传递出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致力于译作表达、认知、交际、文化等功能的实现。此部分将详细阐释许渊冲先生的《长恨歌》英译本中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三者的关系以及译者的适应与选择机制。

西方传统的翻译理论通常将译者看作翻译活动中的附属者的角色,强调译者只需妥协于原文作品和迎合读者的期待,而生态翻译学则是将译者置于动态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赋予译者之生存、文本之生命,构成译者、原文和译境三者之间彼此关联互动的关系。生态翻译学里的“译者中心”理念主要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生态环境的选择和作为生态环境的“身份”对最终行文的选择^[10]。由此可知,译者许渊冲先生在翻译过程中对构成的东西方语言与文化相关的主客观因素的互动,也使得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三者之间彼此联系并产生相互作用,最终得到质量上乘的《长恨歌》英译本。

翻译原则是译者在翻译操作时所遵循的翻译标准。“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是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准绳,具体而言,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基于翻译生态环境层次与维度的差异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11]。与此同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使得译入语和译出语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中保持平衡与和谐。《长恨歌》的翻译过程体现了译者许渊冲先生在语言维度上对形式的适应性转换,在文化维度上对内涵的阐述与传达以及在交际维度上对意图的传递。

三、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文化负载词英译

文化负载词的诞生是由于各民族间拥有不相似的认知环境、生产方式、民风民俗和价值观念等,这些不同逐渐形成了各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由此文化负载词便应运而生^[12]。带有地域和时代烙印的文化负载词是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之间沟通的桥梁,也促进了译境、译本和译者之间关联互动、相互依存和彼此间的

动态平衡。本文参照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准则^[13],以生态翻译学的“多维转换”为框架,选取《长恨歌》英译本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句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译者如何能动地对由原文、译文和译语所构成的生态环境进行“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在语言、文化和交际维度深入挖掘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以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更好地对外传播。

(一) 语言维度

在生态翻译学理论中,“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4],这些转换主要体现在语言的选词、句式结构、修辞和语言风格等方面。文化负载词主要囊括中国的历史、风俗、习惯、成语、谚语和典故等。为了传神地再现中国的民俗风情,使得译文最为贴切地适应目标语的生态环境,译者应当基于语言形式的不同而进行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从而达到译本的生态平衡。本节拟从语言意义、音节韵律和修辞手法三个方面论述译者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语言维度的适应性转换。具体分析如下。

1. 语言意义的彰显

例1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The beauty-loving monarch longed year after year,

To find a beautiful lady without peer.^[15]

例1摘自《长恨歌》的首行,开卷即阐明唐玄宗对天生丽质的意中人的向往与追求,既是故事悲剧的原因又统领全诗。基于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与选择基本原理,人们认为只有像动物和植物这样具有生命体形态的生物才有适应环境的能力。相应地,在翻译过程中,只有译者作为生命体才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原文和译文则是以非生命体的形式呈现的。因此,译者既要翻译生态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又要对译文进行选择性适应。在翻译此句时,译者许渊冲先生运用浅化译法将“汉皇”译为“monarch”。在唐朝,诗人常以含蓄隐晦的方式指代事物,例如在文学作品中常将“唐”称作“汉”,此处的“汉皇”并非实指汉朝皇帝,而是指唐玄宗李隆基。除此之外,在此例中,“倾国”并非“倾覆国家”的文

字表面之意,源引自西汉音乐家李延年为汉武帝献唱的《佳人曲》中的“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此处“倾国”实指极其美丽的女子。因此,译者选择运用等化译法将“倾国”译为“a beautiful lady without peer”,体现了译者为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实现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平衡与和谐。

2. 音节韵律的再现

例2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On western waters blue and western mountains green(b),

The monarch's heart was daily gnawed by sorrow keen(b).^[15]

例2中,诗人运用传统的比兴手法通过描写蜀地山水衬托唐玄宗绵延不断的情思,以有形之山刻画无形之情,借以楚王和神女的爱情典故和“朝朝暮暮”叠词的运用,渲染和增添了唐玄宗内心的凄苦。基于生态翻译适应选择论,译者、原文和译境三者之间的关系需相互关联,但又互相制衡。综观全诗的生态环境,全诗共60行,长达120句,七言贯通全篇,为典型的七言乐府诗,音韵和谐,平仄相间,多用“aabb”式韵脚。原文和译文形式一致,共120行,每行均为12个音节,译文第1~48行为“aa, bb, cc, dd”的尾韵形式,第49~74行为“abab, cdcd, efef”的尾韵形式,第75~120行为双韵形式。此例为全诗的第31行,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生态环境进行适应和最终译文的选择,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采用了“bb”式尾韵形式,对诗歌的音乐、形式和意境之美予以创造性再现,使译文在音韵、形式和意境上均与原诗达到相似的效果,实现了在诗歌的语言维上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体现了文本生命、译者生存、翻译生态环境共同的价值追求。

3. 修辞手法的运用

例3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On high, we'd be two lovebirds flying wing to wing,

On earth, two trees with branches twined from spring to spring.^[15]

例3选自《长恨歌》倒数第2行,阐述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长生殿里互相表达心中爱恋的誓言。

“比翼鸟”指的是一目一翼、雄雌并翼飞行的一对鸟,“连理枝”指的是两棵树干合生在一起的植物。诗人在此处运用比喻和象征的修辞手法,以“比翼鸟”和“连理枝”比喻夫妻双方互相扶持和相互依赖的美好情感,以托物寄意的象征手法对矢志不渝的爱情作了诠释,表达了恋人彼此美好的愿望。由于原文的生态环境中蕴含着对偶和排比用法,因此译者首先采用等化译法将“比翼鸟”译为“two lovebirds”,将“连理枝”译为“two trees with branches”,将原文中比喻和象征修辞手法完美复刻。许渊冲先生通过对译诗“三美”的不懈追求,对等化策略的主动性判断和适应性选择,达到了让读者知之、好之、乐之的翻译目的,完成了文本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的移植,实现了译本在译入语的生态环境中能够持久存续,最后产出了“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译文。译者同时采用增译法创造性地在译文中增加“spring to spring”,这与前句“wing to wing”构成形式对应,再现了原诗的对偶之美。译者选择中有适应,适应中有选择,保证了原文与译文传神和达意的平衡,从而最大程度地兼顾了原语与译语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 文化维度

在生态翻译学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重视原语与译语文化内涵的传递和阐释,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译者要关注原语和译语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上性质与内容的差异^[14]。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时要对原语和译语所属的生态文化环境加以考量,寻求二者的相似与互异之处,在共性和个性之中促进文本、译者和译境彼此关联和动态平衡。下面将从生态文化和物质文化负载词切入,探讨译者如何通过“适应”与“选择”实现文化维度的动态平衡与和谐。

1. 生态文化负载词

依据奈达对文化负载词的分类标准,生态文化负载词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一切与有机植物、动物和人相关的词语以及它们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例如地理环境、水文特征等之间的关系^[16]。由于中西方地理位置、地形地貌、气候与水文特征形态各异,因而生态文化负载词在中西方各自语

言所属的生态文化环境中彼此处于缺失状态,这就需要译者从生态理性的综观视角,探讨中西方在彼此语言文化系统中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以实现彼此之间的动态平衡。

例4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But rebels beat their war drums, making the earth quake,

And “Song of Rainbow Skirt and Coat of Feathers” break.^[15]

例4摘自《长歌行》第16行,描述的是渔阳的战鼓声震天动地而来,惊断了宫阙之中正在弹奏的《霓裳羽衣曲》。“渔阳”为唐朝郡名,当时隶属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所管辖的区域,辖今北京平谷区和河北蓟县一带,此处指代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的事件,史称“安史之乱”;“鼙鼓”指的是古代骑兵所用之小鼓,此处泛指战鼓。由于外国读者对中国古代的“安史之乱”事件的具体细节不甚熟悉,如若只音译“渔阳”这个地名,则无法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译者采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将“渔阳”译为“rebels”,将“鼙鼓”译为“war drums”。如此既不会因为将历史事件全译而显得译文冗长乏味,也很好地避免了深层文化内涵的无效传递,为译语和读者勾勒出战争以席卷之势爆发的画面和唐玄宗沉湎于歌舞欢乐之中的情景,二者形成强烈对比。如此,译者通过“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过程将原文生命移植入译本生命,在新的语言、文化和交际生态中呈现出一种静态生命的状态。

2. 物质文化负载词

在生态翻译学领域,翻译生态环境指影响翻译主体生存与发展的一切外界条件的总和,包括与翻译活动相关的自然经济、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环境等^[14]。也就是说,主体和客体环境、物质和精神环境等共同作用于整个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物质文化主要经由人类所制物品予以体现,涵盖衣食住行、技术设备和交通工具等^[17]。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造成同一生活物质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表述稀缺甚至意义相悖。这就需要译者采取适宜的翻

译策略以达到原语和译语二者生态文化的平衡。

例5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None would pick up her hairpin fallen to the ground,

Or golden bird and comb with which her head was crowned.^[15]

例5摘自《长恨歌》第20行,描写杨贵妃香消玉殒时的凄凉惨状,额头上的花钿散落一地无人拾取,其中有珍贵的翠翘、金雀和玉搔头等饰品。“花钿”指的是一种用金翠珠宝等制成的花朵型首饰;“翠翘”指的是一种镀为翠绿色、如鸟翘着长尾似的头饰;“金雀”和“玉搔头”分别指的是雀形的金钗和玉制的簪子。这些饰品都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特有的头饰,不仅对于目标语生态环境的读者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异质”物质文化负载词,甚至对于原语生态环境中当今时代的读者而言也是遥远的历史遗留物。因此,译者运用“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将“花钿”译为译语生态环境中读者所熟知的“hairpin”,将“翠翘金雀玉搔头”译为译语生态环境中读者所理解的“Or golden bird and comb with which her head was crowned”,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清晰且直观的形象,既贴近译语生态环境中译者的表达习惯,又最大限度地阐释和传达了原文的信息,从而达到文化维度的适应性生态平衡。

(三) 交际维度

在生态翻译学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原语和译语之间交际意图的适应性转换^[14]。也就是说,译者不仅要关注语言信息的传递和文化内涵的呈现,还要将原文的交际意图传递给读者,达到原语与译语生态环境中交际维度的平衡。社会文化负载词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交称谓、社交礼仪、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到时代背景等,既是民族、社会、文化的产物,又是社会信息文化的载体^[18]。社会的习俗和历史变迁等都以鲜活的形式烙刻在文学作品中,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不仅要注重语言和文化维度的适应性转换,还要关注交际意图是否在原文中得以体现,从而达到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

例6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All her sisters and brothers received rank and fief,
And honours showered on her household, to the
grief.

Of the fathers and mothers who'd rather give
birth,

To a fair maiden than any son on earth.^[15]

例6选自《长恨歌》第12~13行,叙述了杨贵妃宠冠六宫并由此惠及家族,引得天下父母艳羡不已,以求生个美丽女孩而使家族显达。诗人以杨贵妃光彩门户事件展现了当时社会百姓在生儿育女观念上的强烈转变,颠覆了中国封建社会历来以男子学优则仕、摄职从政和光宗耀祖的儒学主流思想观念,增强了反讽效果。在原文中,“列士”指的是分地封赏,译者在翻译时运用深化译法兼顾了原语和译语文化性质和内容的差异,将“列士”译为译语读者所理解的“rank and fief”,对文化的深层内涵进行了阐释并予以准确传递,从而达到了原语与译语在交际维度的生态平衡。除此之外,译者在翻译“可怜光彩生门户”时运用了增译法,在句尾增加“to the grief”与上句形成了尾韵对应,使得译文与原文在音韵、形式和意境上与原文呈现出相似的效果,达到原语与译语环境中交际维度的生态平衡。

四、结语

本文从生态翻译理论视角出发,以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长恨歌》作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所用的英译策略。研究表明,生态翻译理论框架下的多维适应与选择为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提供了新的思路。首先,译本与译境的生态平衡都需要通过译者的多维适应和选择来达成,体现了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三者之间关联互动和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为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探索提供了借鉴,弥补了以往研究中忽视译者生存的不足之处。其次,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不仅是语言形式的转换,也是在双语生态环境的认知编码过程中语言、交际、文化等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体现了文本生命由原语生态环境移植到译语生态环境再生的过程。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异”和“新”——不同翻译研究途径的比较研究并兼答相关疑问[J].*中国外语*, 2014, 11(5): 104-111.
- [2] 熊莺.《长恨歌》文本的现代阐释和世界文学价值重构[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0(2): 66-73.
- [3] 张晶,钟信跃.从生态翻译学视角看苏曼殊的外国诗歌翻译[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36(4): 193-196.
- [4] 汪莹,钟锦.诗歌翻译中的译者中心论[J].*思想与文化*, 2021(1): 371-382.
- [5] 龙翔,刘一梦.《饮酒》(其五)的五种英译本深度对比研究:生态翻译学视角[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2, 30(1): 109-114.
- [6]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 [7] 胡庚申.文本移植的生命存续——“生生之谓译”的生态翻译学新解[J].*中国翻译*, 2020, 41(5): 5-12.
- [8] 胡庚申.翻译研究“生态范式”的理论建构[J].*中国翻译*, 2019, 40(4): 24-33.
- [9] 胡庚申.刍议“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2): 125-131; 160.
- [10]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中国翻译*, 2014, 35(1): 29-35.
- [11]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 2008(2): 1-5.
- [12] 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 [13] NIDA E 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3.
- [14]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 2011, 32(2): 5-9.
- [15] 唐诗三百首[M].许渊冲,译.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3.
- [16] 廖治敏.从多元互补视角剖析四川旅游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的汉译英[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2011.
- [17] 胡庚申.对生态翻译学几个问题“商榷”的回应与建议[J].*中国翻译*, 2014, 35(6): 86-89.
- [18]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New York: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1988.

(责编:朱渭波)